

Selected Graduation Theses(projects) of Zhaoqing University's First Graduate



肇慶學院

ZHAOQING UNIVERSITY

首届本科生 优秀毕业论文〔设计〕选

春华秋实

Chun Hua Qiu Shi

主编 邝邦洪 副主编 和飞 周苏平



广东人民出版社

肇庆学院

首届本科生

优秀毕业论文（设计）选

Chun Hua Qiu Shi

春 华

秋 实

主编 邝邦洪 副主编 和飞 周苏平

广东人民出版社

主 编 邝邦洪 副主编 和飞 周苏平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春华秋实：肇庆学院首届本科生优秀毕业论文(设计)选/ 邝邦洪主编.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 12
ISBN 7-218-04788-2

I. 春... II. 邝... III. ①肇庆学院—毕业生—毕业论文②肇庆学院—毕
业生—毕业设计 IV. G642.477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 16
印 张	24
插 页	1
字 数	550 千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500 册
书 号	ISBN 7-218-04788-2/G·1219
定 价	5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公司联系调换。



彩图 1 脸谱彩灯



彩图 2 秋色赛会游行第十三项
——陆地行舟



彩图 3 巡游中的花车



彩图 4 头牌



彩图 5 龙凤大彩灯



彩图 6 彩龙



彩图 7 莲花仙子贺新春



彩图 8 被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确认为世界最大的龙灯



彩图 9 鹅蛋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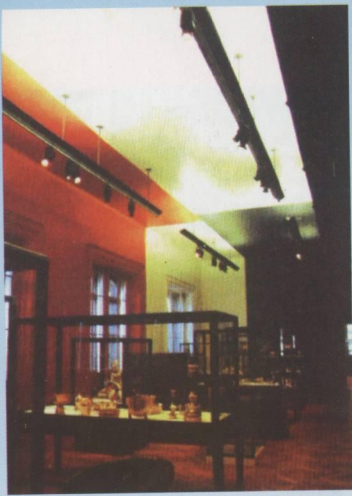
彩图 10 灯芯灯



彩图 11 刨柴灯



彩图 12 佛山现代大型环境灯色
——千灯湖夜景



彩图 13



彩图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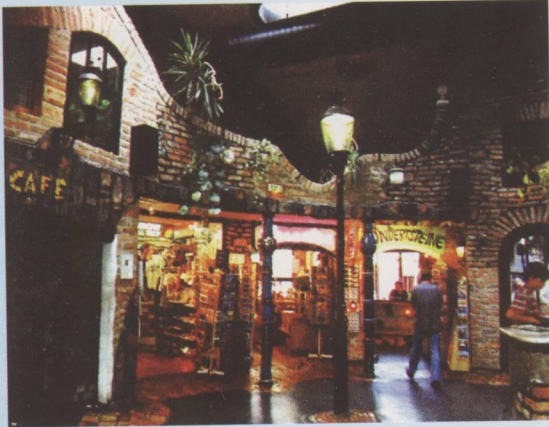
彩图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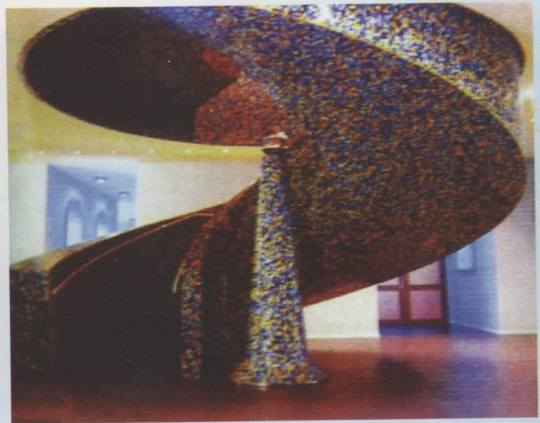
彩图
14



彩图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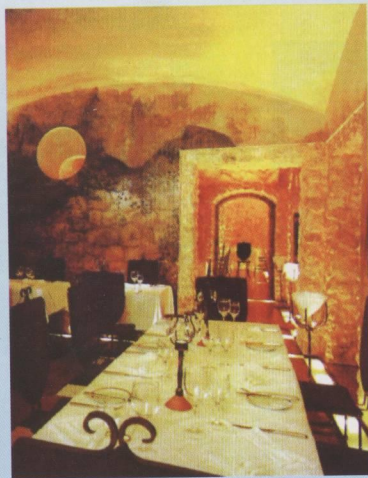
彩图
16



彩图
17



彩图 20



彩图 21



彩图 22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邝邦洪

副主编 和 飞 周苏平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敏 刘幸东 杨迎春 张 信

姚 英 秦国林 麻幼学 薛国庆

序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本《春华秋实——肇庆学院首届本科生优秀毕业论文(设计)选》是教务处的同志编辑而成的,意在记录我校本科教学工作的初步成绩。付梓之前嘱我作序。2000 级的学生作为首届毕业生刚刚离校,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教务处的几位同志就完成了组稿、排版、校对等诸多工作。时值盛夏,酷暑难当,其辛苦可知,故欣然从命。

肇庆学院是 2000 年 3 月经教育部批准,由原西江大学与肇庆教育学院合并组建而成的一所本科层次的综合性地方大学。升格本科后,全校教职工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本着“团结、奋进、求实、创新”的校训精神,励精图治,克服了种种困难,利用两年多的时间,完成了由专科到本科的转型。此后,学校的发展步伐不断加快,教学工作的各个方面又取得长足的进步。经过四年多的积极建设,以本科教育为主体的办学格局已经形成,教育教学质量正稳步提高,办学实力不断增强。到目前为止,学校已经发展成为粤西地区唯一一所办学规模较大、教学设施比较完善、师资队伍整体素质较高、学科门类较为齐全的综合本科院校。

我是 1997 年从华南师范大学调到原西江大学工作的,至今已整整七年。作为校长,我参加并主持了肇庆学院的初期筹建工作,亲身经历了两校合并、由专科升格本科的全过程,与全校师生共同努力、勤奋工作。学校于 2004 年 4 月顺利地通过了广东省学位委员会组织的学士学位授予单位的评审,获得了学士学位授予权。回顾学校的发展历程,我深切地体会到:上述成就的取得是我校多年来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结果,是广东省委省政府、肇庆市委市政府和 390 万肇庆人民亲切关怀、大力支持的结果,是我校几代领导和师生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劳的双手,经过三十余年艰苦奋斗的结果。

近几年来,全校师生在校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紧紧围绕教学工作这个中心,全面推动学校的各项工作,使我们的学校在高等教育事业飞速发展、教育资源竞争异常激烈的大背景下,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为学校未来的建设和发

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此，我感到无比的欣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

现在，2000级学生已经顺利地完成了四年的学业并如期毕业。他们作为我校独立招收和培养的第一届本科生，在校期间奋发努力、刻苦学习，为自己的母校赢得了许多荣誉。他们中间，有人曾在强手如林的“CCTV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中，过关斩将力夺优胜；也有人在名校老校称雄的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奋力拼搏勇摘桂冠；更有中文系、数学系、电子信息工程系、政法系和外语系的十几名同学立志高远，经过努力考取了硕士研究生。他们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自强精神在肇庆学院的发展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他们铸就了母校永远的骄傲，也托起了母校未来的希望。

这本论文选真实地记录了2000级本科生学习生活的一个侧面，所收的几十篇论文尽管语言犹显稚嫩，但各自论点鲜明、论证严谨，更洋洋洒洒以数千言计，足见已初窥科研之门径。这充分说明我们的学生很好地掌握了本专业不同学科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并初步具备了科学研究的能力，假以时日，其中定然不乏登堂入室者。我真诚地期待着，期待他们植根南粤这片沃土，绽放鲜花、结出硕果；我热切地期待着，期待他们在祖国的各条战线上勤奋工作，为我们的肇庆学院增光添彩，书写辉煌。

停笔之际，偶得一句，把它写在下面，与全校师生共勉：

雏凤声声，奋起老骥千里志；桃李灼灼，可慰杏坛一片心。

是为序。

邦邦洪

甲申年秋于肇庆学院

目 录

- 《花城》25年(1979—2004):先锋与多元的坚持..... 陈海锋(1)
- 传统与现代的融合——论张爱玲《传奇》的艺术风格 孔健华(9)
- 论司空图的创作风格及其文化心理 薛幼萍(17)
- 试论毕淑敏小说中的医生视角特性 林志奋(27)
- 解不开的君子情结——白嘉轩人格内涵的矛盾性 莫财达(34)
- 对六朝“昭君怨”主题的拓展与消解——略论唐宋诗人的吟咏昭君诗
..... 林小平(40)
- 论新课标下语文学习的体验性 曾木全(51)
- 《源氏物语》中兼具男女两性叙事话语的表现及意义 杨旻焰(58)
- 论中学语文学科的文学教育 李韵(64)
- 试论简·奥斯丁作品的人文关怀 黄演(71)
- 不可隐没的男性主导观念——对20世纪前中西文学女性抗争主题的反思
..... 谭锐(78)
- 试论探究性阅读教学的指导策略 谢燕(85)
- 人生价值冲突及其可能的解决方式 黄碧璇(92)
- 关于个人主义的几点思考 吴忠平(103)
- 网络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新探索 陈凤仪(112)
- 中值定理“中值点”的渐近性质 张其英(120)
- 浅谈一元函数的极限与连续 梁慧祯(129)
- 关于Cauchy-Buniakowski不等式以及若干Cauchy类不等式的构造
..... 张苏伟(140)
- 矩阵在多项式理论中的应用 黄赞(150)
- 大学生素质综合评价体系 苏华飞(163)
- 《数学课程标准》指导下的中学数学课堂教学初探 王翠琼(173)
- 误差界对在收敛级数求和中的应用 童永英(183)
- 通用型随机试题库系统构建与实现 刘国华(190)
- 具有自动功率因数校正的逆变电源 田石华(200)
- 基于AVR单片机的燃气热水器温度控制系统 周志明(209)

多通道数字比例遥控系统	陆海锋(216)
单电源双微分绝缘门极双极型晶体管门驱动电路	莫国文(226)
光无线电局域网接口技术的研究	熊世晃(232)
基于 AVR 单片机的温度控制系统	卢广平(251)
嵌入式 LINUX 数据采集硬件设计——驱动程序	梁伟中(258)
可编程控制器在交通灯监控系统上的应用	曾家龙(268)
数字温度仪表的无线传输	叶泽光(275)
佛山民间工艺研究	杨小芬(283)
符号在绘画中的应用	黄练基(289)
信息传递·视觉无限——超级平面美术在室内设计中实效性的研究	黄伟玲(294)
Analysis of Emily's Tragic Character	白少英(300)
English Metaphors, Translation and Culture	郭珊珊(309)
On John Milton's Portrayal of Satan in <i>Paradise Lost</i> —— Hero or Villain	何飞(322)
On Effectiveness of CLT in English Class	黄美静(335)
The Writing Artistic Style of the Short Stories by O. Henry	陆莉莉(345)
Foreignization & Domestication are Two Practical Ways in Translating English metaphors into Chinese	吴绍斌(355)
Teaching for Communication	曾悦怡(365)
后记	(375)

《花城》25年(1979—2004): 先锋与多元的坚持

中文系 汉语言文学专业 陈海锋

指导教师 王 敏

摘要:《花城》杂志从1979年创刊至今,已历时25年。《花城》立足广东,影响全国,在20世纪80年代曾与《收获》、《十月》、《当代》并列为中国文学期刊的“四大名旦”,所刊发的作品,代表了一个时期中国文学的重要成就,为推动当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在今天的中国文学期刊之林中,《花城》以其先锋和多元特色深得读者喜爱。《花城》在先锋文学阵地上的坚守,是推动中国文学继续向前发展的重要引擎。

关键词:《花城》;文学期刊;先锋;多元

《花城》创刊于1979年,是由广东《花城》杂志社编辑主办的文学双月刊,因其身处南方都会城市广州(广州别称花城)而得名。在1982年前,该刊未署名编辑,直至1983年第2期发稿编辑始署名,一直由范若丁、谢望新等人负责;1987年,由李士非任主编;1990年,范汉生接任主编;1995年,肖建国任主编,田瑛任执行主编至今。

应该说,就文学区位而言,广州先天性缺少像北京、以上海南京为中心的长三角、湖南以及陕西等省市的作家群落,在中国的文学版图上并不起眼。然而,自1979年创刊以来,《花城》杂志就以一个先锋者的形象在中国文学界赢得了尊重。这不仅是因为其能在今天纯文学期刊逐渐萎缩的文学生态中“独树一帜”,拥有自己居高不下的相对稳定的读者队伍(《花城》最高发行量达60万本之多),而且因为它拥有高屋建瓴地把握文学流变和作品内质的独特眼光。在新时期文学进程中,《花城》同步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其所刊发的作品,代表了一个时期中国文学最重要的成就,为推动当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张洁的《祖母绿》、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北村的《施洗的河》、陈染的《私人生活》、毕飞宇的《青衣》等等代表新时期文学重要收获的作品,都是首先刊发于《花城》。在今天的文学期刊之林中,《花城》也许是唯一仍然抱定了先锋与多元之柱的遗存。

当代文学期刊研究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这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很多,具体到《花城》的研究更是非常零散。对《花城》研究的明显不足与这本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作出突出贡献的文学杂志的地位是十分不相称的。《花城》虽然自1988年第3期以来,每年组织一批作家、学者对其当年所刊发小说作综述,但对于它25年发展历程的系统研究,却是鲜见于纸上。近年来,黄发有、王云芳、谢永新等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研究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工作,开创了当代文学期刊研究的新格局。本文尝试通过对《花城》25年及其在新时期文学中的价值和地位的探讨,努力寻找出在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发展轨迹中,期刊应该和正在担任的角色和所发挥的作用。

一般来说,我们以为在文学运动中,重要的是作家、评论家,考虑到读者已经是比较先进而开放的观念了。所以,对以编辑家为核心而构成的“期刊行为”几乎遗忘。其实,如果说得绝对一点,一些期刊诞生了,一些期刊消亡了,这句话就可以构成以现代工业及商品社

会为背景的现当代文学史的一个侧面。

以新时期文学而言,很难设想没有《收获》、《花城》、《十月》、《大家》、《当代》、《人民文学》、《上海文学》……会是什么面貌,如果以为即使没有它们也会有另外的期刊,那实在是天真的想法,因为期刊是“活”的。而期刊的“活”是与文化环境、传媒系统、编辑思想、期刊行为联系在一起的,同时编辑思想及其指导下的期刊行为可能就是某一时段社会意识、文化思潮、审美理想及文学观念的体现。事实上,这些观念性的东西要化为真正的文学“事实”,在现代传媒时代,离开期刊的参与是不可能的。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学环境随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急剧变化,这主要体现在文学期刊的生存变化上。“90年代市场经济的推进,对新中国成立以后形成的数十年一贯制的文学体制产生了强烈冲击。文化市场的初步形成,使文学传媒(主要包括文学报刊、文学出版机构等)的生存环境出现了重大转变。纯文学期刊的定位从生产本位走向了消费本位,从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过渡。随着政府拨款的减少直至‘断奶’,相当一部分纯文学相继‘改嫁’或‘关门’,一些期刊开始标举通俗文学,另一些期刊则改版为文化类、综合类期刊,另觅出路。”^①文学期刊在文学的“商品化”趋势下遭遇到“生存危机”。在这股文学冷风下,文学期刊纷纷改弦更张,但在这些变革中能够在商业与文学两方面都取得成功的文学期刊似乎并不多见,“除了有限的几家期刊外,好多文学期刊的变化,从办刊思想到运作模式都与我们的‘期刊理想’相去甚远。”^②当下是“市场”的天下,期刊的变化似乎并不是取决于知识者的价值取向,更多的却是取决于“消费历史”的法则。因此,有评论家指出,“如果说80年代的文学轰动是成功引爆了政治、社会的兴奋点,那么,90年代能够称得上轰动的文学现象只能是商业对文学的成功招安”。^③文学理想在经济的困顿下似乎正一步步走向泯灭。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阅读与理解《花城》杂志,就不得不佩服它的那种勇气:对纯文学阵地的坚守,这一姿态,甚至于可以说是一种可敬的坚持。

25年来,《花城》在坚持的过程中变化发展,通过选择与积淀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刊物精神、办刊意识和刊物作风,成型了一批品牌栏目并以此参与到当代文学发展的进程中去。

在1979年创刊之初,《花城》的着眼点其实并不是在于先锋性、多元性,而是在于海外性,在于突出南国特色,在于介绍海外华文文学。但可惜的是,似乎它在南国特色方面取得的成就并不大。这或许与广东文学力量的长期孱弱有关。所刊登的作品,“广东特色不多”^④。《花城》曾尝试着培养本地作家,先后推出岭南风(1983年第1期)、广东女作家小辑(1987年第2期、第3期)、特区军旅文学(1990年第4期)、《大鹏湾》小辑(1991年第2期)、广东作家小辑(1993年第1期)等系列栏目,但收获不大,影响有限。与此相反,它的“洋”味却颇重,先后推出了“香港文学作品”、“海外风信”、“外国文学”、“访问记”、“香港通讯”、“台湾作品选”、“港台文学”等特色专栏,向国内读者和作家推介赖和、陈映真、原甸等港台作家的作品。应该说,这些专栏的推出,对海外华文文学、外国文学的介绍,在当时还是比较封闭的文学环境下,是开了一个时期之风,对中国内地“新时期”作家的视界,他们的感受、思考和表达方式的革新,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另一方面也使得海外的人们得以通过《花城》了解中国内地的文学状况。至今,人们每每谈起中国内地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无不认为《花城》创刊号中曾敏之的《港澳与东南亚汉语言文学一瞥》是中国内地第一篇介绍并倡导关注本土以外汉语文学的文章^⑤。那是一个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文学事件。我们从中也就可窥见到那个时期的《花城》对于中国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影响了。

《花城》真正在中国文坛产生影响是在1984年,那时正值中国小说界创新意识高涨的时间。这一年,文学的先锋性探索已经开始,“现代派小说”是创新潮流中首先出现的现象。《花城》敏锐地预见到“先锋”之潮的到来,鲜明地亮出自己的编辑方针。“在各种文学样式中,我们主要突出中篇小说。”1984年,“《花城》共发中篇小说三十三部,为创刊以来历年之冠。其中一些作品,在读者中反应强烈”。^⑥包括张洁的《祖母绿》、张笑天的《错过太阳和群星的人》、刘心武的《日程紧追》、韩石生的《魔子》、周梅森的《崛起的群山》、刘西鸿的《月亮,摇晃着前进》等等。通过研读刊发的作品,我们可以强烈地感觉到那个时期的《花城》办刊已经初步具有小说实验意味。毫无疑问,这次编辑方针的改变是成功的,它受到了国内文学界的关注。为了进一步挖掘文学创作的深层内核,推动当代文学向多元方向发展,推进文学“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审美意识的深化”^⑦,《花城》于1987年第3期推出了“现代流向”的特色栏目,并在总结经验的过程中完善;开办几年中,此栏目成为散发着浓郁哲学意味与精神气息的阵地。一般认为,《花城》不仅是理解敬重这些学者,还十分愿意把这些思想者的恢弘之气吸引过来,借以扫除浮靡无聊之风,担负起启蒙以及思想的任务,使人类日渐喑哑的声音恢复到它当初的洪亮深沉,这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更令人觉得难能可贵的是,《花城》在坚持先锋性过程中,并未对不同风格的作家作品进行强求一律的归类,更没有利用甚至苛求作家违心的创作来演绎和印证期刊的审美理念与策划目标。对于好的能打动人的作品,它能够不拘一格。路遥的现实主义作品《平凡的世界》(《花城》1986年第6期)在遭遇到几家文学刊物的拒绝后,被《花城》慧眼录取。事实证明这部作品的确是“当代不可多得现实主义力作,在群众中引起轰动,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⑧。《花城》的包容性,通过对多元风格作品的宽容组合,形成了一个异彩纷呈的办刊效果。

仔细研究《花城》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它对先锋、多元的选择从一开始并不是注定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促使它选择这样的道路呢?我们认为,这是由它所处的地域形势和中国文学发展规律决定的。地处南方广州,造成了《花城》地位上的尴尬。一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南方都会的广州是中国的又一大经济中心。在人们的印象中,那里经济利益已成为社会的运行杠杆,人们热衷于追逐社会物质文明,在这热闹的地方,似乎是很难养住那些大虚静大孤独的纯文学,艺术的命脉已很稀薄,人们对充满商品意味的南方能否坚守住艺术和意义的生活差不多都持怀疑态度。再者,人们普遍认为,“北方的内陆省份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而沿海这边的南中国,自古则是瘴疠蛮荒地之地,文化的历史是微不足道,而现在的经济开放政策,并没有改变其艺术的滞后性”。^⑨《花城》的发展一开始是不被人看好的。但另一方面,也许正是因为地处边缘的特点,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放逐形态,以及经济利益的社会运行机制,所以也就自觉不自觉地形成岭南文化相应的开放与兼容。广东的边缘形态在时间与空间、角色认同与文化定位方面的内在矛盾与多重冲突,一方面固然给它带来了难以平息的困惑和期望,另一方面又沟通了异质的文化体系、精神空间和历史视野,它们的混合与互动产生了多元的文化趋向和复合的价值认同,拓宽了自己的视野,在兼收并蓄中培育新的可能性。边缘性以及边缘角色的确立,使人对一统的东西可以作一巧妙逃离。这也就使得广东乃至于《花城》具有了多元兼容性的可能。

陈思和先生曾在他的《边地花草》中指出,期刊界出现了“边缘繁荣胜中心”的趋向。^⑩我们认为这其中的“边缘”也理应是包括远离北方政治文化中心的南方广州,也就理所当然地以《花城》为代表。的确,在20世纪80年代,京沪等地的文学期刊成为全国文学创作的核心,但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不少名刊在商业和其他控制力量的影响下,变得越来

越平庸,办刊策略日趋浮躁,甚至热衷于炮制新的口号或命名,哗众取宠,很少推出真正具有艺术独创性的作品。此外,一些招牌刊物日益固定的风格与模式,在推举其一贯偏好的审美风格的同时,也排斥了一些新生的、富有探索性的文学趣味,对欲入其门的作家的创作构成了无形的限制,使文学的话语空间不能得到有效的拓展。京沪等地的招牌刊物大都偏爱名家作品,偏爱厚重的、宏大的、具有史诗性的审美风格,冷落甚至排斥那些容易引起争议的、有审美冲击力但不完全成熟的、与刊物所标榜的特色相悖的创作追求。《当代》对张炜的《九月寓言》的退稿以及与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的失之交臂,便是有力的例证。这样的情境下,《花城》处身于边缘地区,边缘的状态反倒使得精神获得了相对的自由,在缝隙中迂回周折。当社会呈多元趋势发展时,意识形态这下反倒可以脱离主导。再者,处身于广东经济开放区,《花城》过早地接触了市场,具有一定的市场适应力。这样,市场调节之于艺术的发展一方面更艰难,一方面又具有了更大的兼容性与灵活性。从而,生存、成长在广东这所谓的“文化沙漠”上,《花城》的坚持也就近乎于一种神圣。因而当《花城》吁请精神价值、思想意义及终极关怀时,它并不是古典保守主义的吁请,相反是恰恰体现在它的先锋性、现代感上。

二

“先锋”的概念有着复杂的文化内涵。中国当代文学中先锋精神的源头一直可以追溯到“文化大革命”中青年一代在诗歌与小说领域的探索,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中激进的实验才形成了强大的阵容和声势。所谓先锋精神,意味着以前卫的姿态探索存在的可能性以及与之相关的艺术的可能性,它以不避极端的态度对文学的共名状态形成强烈的冲击。

《花城》所倡导的“先锋性”是其边缘意识和文化角力的集中体现。《花城》认为作家应“力求独树一帜,表现个性。没有个性,就不能形成艺术;没有个性的作家,也就不能成其为艺术家”^①。从而对文学主体性和自由创造精神的提倡,推动了作家在叙事风格、语言形式和思维方式的探讨与改变。但是,“实验从来就是要付出代价的”。由于《花城》作者队伍的青春品格,使其探索性具有一种试验色彩,甚至不无莽撞和冒险的意味。比如《花城》在1994年的“新小说”和1999年的“实验文本”栏目中推出的一些晚生代作家的写作,要么因过于偏重文体革新而丧失了作品的现实力量与批判精神,甚至在内容与形式层面相互冲突;要么因过度沉溺于欲望化叙事而屈从于世俗法则。对此,我们认为文学探索中的失误与局限,只有通过时间的验证、自我的反省和实践的修正,才能走出迷惘,向更深的文学层面掘进。

一般而言,“从文学本体的角度看,小说的形式感是它获得生命的前提,正是这种形式感将我们导向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所在。如果说80年代中期的‘先锋小说’通过文体的实验、语言的自觉,将文学话语表达从政治话语的束缚中解救出来,完成了一次文体革命的话,那么可以说,90年代末的文学文体的实验则旨在划清日益模糊的文学与新闻之间的界限”^②。因而,在这种情境下,20世纪90年代的文体实验的代价往往就意味着可读性的丧失:先锋小说以形式游戏冲淡现实意旨的倾向,大大地削弱了作品的可读性,使小说与读者的距离越来越远;而“新生代”作家玩世不恭的道德挑战和随波逐流的虚无主义,在给小说带来新的生机的同时,也涌动着内在的危机——而这,几乎是我们视为文体实验的一个不成文的外部标志,人们不禁因此替文学担心。也许,《花城》深刻地体认到这一点。因而当文

体实验在1999年掀起了一场可谓声势浩大的“内热”时,对比《大家》的“凸凹文本”、《作家》的“作家实验室”、《山花》的“文本实验室”、《莽原》的“跨文体写作”等成为这些文学期刊的主打栏目之时,《花城》却颇为意外地保持低调,在“实验文体”的名下,它只提供了张锐锋的《皱纹》(1999年第1期)和赵玫《怎样证明彼此拥有》(1999年第5期)。我们认为,这种低调,正反映着《花城》办刊的成熟,对文学理想的理性把握。

“多元性”的审美观是《花城》的另一个重要品质。由于身处广东,远离政治中心,靠近海外,广东独有的岭南文化的宽容品质及随之而来对个体的尊重精神深深地影响着《花城》。随着中国社会挣脱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控制,这里求新求异的市场规律和文学主体精神也就最先走向觉醒,使得文学形态和价值趋向呈现出多样化走向。我认为,《花城》对不同风格、流派、形式的作品的兼容,是对转型时期文学的多元化和个性化趋向的尊重与呵护,以自己公正、客观的立场克服文学偏见,超越功利意识,沟通不同的审美理想与创作立场,努力使《花城》成为一个多元交流、平等对话的精神空间。《花城》的这种办刊风格,带着深刻的广东文化的烙印,通过体认到自己的地缘局限与历史缺陷,来提倡多元交流,纠正长期强调地域性的自我封闭,努力把自己打造成为“话语中心”之外的“话语平台”,尽可能扩大自己的信息包容量和审美多样性,吸引更多的作家和读者。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中国网络文学迅速兴起。《花城》“以锐利的目光和博大的襟怀采撷名篇佳作,同时正视网络的力量,加大推出新人新作的力度”^⑨,并于2002年度第3期刊发了对话体网络小说《隔壁情人》,反响极大。这意味着《花城》作为纯文学的代表率先对网络小说的认同。事实上,《花城》的多元还更多地表现在不看重名气与文体的眼光:刊登与当前文学思潮主流意识不尽相同的作品(譬如路遥《平凡的世界》的发表正值先锋小说高涨期)、或发表青年作家的不成熟创作固然会给它带来“读者不掏腰包的危险”,但对于中国文学的一份责任却又常常使它忘记了经济上的短视。《花城》的开放的胸怀,为非主流写作的作家和青年们提供了一个集中展示才华的舞台。由此,我们不妨这样设想,假如没有《花城》的坚持,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是否能够拥有那么一批重要的作品(譬如现实主义的《平凡的世界》、先锋派的《日光流年》以及一些重要的女性文学作品)?是否有着今天多姿的文学景象?是否可以避免一些遗珠之恨?或许,《花城》对多元的坚持也正是文学史的机遇与偶然的幸运结合。从中也可以这样理解,《花城》的多元性文学观的目光远大。它没有停留在青睐名家新作、先锋和社会正面反响较大的作品上,更多的还是表现在对形式探索的作品,新人新作和引起争鸣甚至非议的作品上。这就形成了它的选稿范围和审美趣味的广泛。

我们认为,《花城》提倡的“先锋”与“多元”,两者并不矛盾。一是因为两者的出现是《花城》生长的文化土壤作用使然;二是一方面倡导先锋可以推进“多元”的写作形式出现,造成百花齐放的局面,同时“多元”的写作形式的大量涌现又反过来促进了“先锋”文学的繁荣。而随着“先锋”和“多元”的结合并最终形成一股合力,进而也就促成了《花城》的“先进的文学预见性”的办刊思维特点形成。

“先进的文学预见性”是《花城》一贯的办刊思维,它对文学思潮的敏锐触角,超前的文学预见性,对文学主体性和自由创造精神的提倡,推动了文学在叙事风格、语言形式和思维方式的探索与改变。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迅猛发展。在这其中,《花城》与其说是一个见证者,还不如说是一个参与者。1981年至1984年,它承接“伤痕”、“反思”文学之潮,相继推出了“怀念与思考”、“回忆与思考”栏目,为“文化大革命”中历经磨难的老作家们提供一个写作园地,鼓励他们延续自己的写作生命;那个时期,也正值改革

文学在暗潮涌动，“尝试小集”就顺理成章地于1980年第6期推出；先锋文学随着文学的继续发展先期而至，顺应潮流，《花城》推出“现代流向”栏目，并增发先锋小说，坚持倡导先锋性、实验性的文学写作；随着文化市场的变化，《花城》也在栏目上稍作了改动：在1987年第4期推出纪实文学，1988年推出散文诗，1990年第4期、1991年第2期推出特区文学，1994年推出新小说写作、1999年推出实验文本写作。可以说，每一个栏目的推出，都表现出它在新时期文学思潮涌动中富有文学预见性的期刊创意，体现了编辑对于新的审美可能性的深刻洞察，更是对处于萌芽期的文学新向度的扶持与推动。2004年第1期，《花城》再次推出新的品牌栏目“花城出发”。在“编者按”中，它道出了推出新栏目的原因：“在坚持本刊宗旨的基础上，着力发挥新人新作，为文坛培养后续力量。此栏目张扬原创精神，鼓励作家对人生真相的洞悉和心灵秘密的发掘，重视文本的实验性和独立探索精神，加速文学内部的变革，最终推进汉语写作。此栏目亮相的作品未必十分成熟，但由此可窥见作者纯粹而高远的文学理想。自1979年创刊以来，《花城》以‘您最后的精神家园’为宗旨，坚守纯文学的品格，与新时期文学一道成长壮大。”在我们看来，这一段朴实无华的文字，其实正是《花城》勇于肩负建设中国文学责任的宣言书。

李松岳、陶东风两位学者曾这样评价《花城》：“通过对刊载其上的大量文本的研读，人们当会深切感受到《花城》主办者的独特眼光和追求，并进而明了其与在当前的刊物中难以替代的位置”^⑨。的确如此，在《花城》中，我们常常能够看到一些张扬原创精神，形式和文体力求创新的实验文本。它们或许未必十分成熟，但作家那种对人生真相的洞悉和心灵秘密的发掘却往往能让人耳目一新，使人感动。基于此，我们也就更愿意这样理解《花城》的“先进文学预见性”：它是建立在对文学的内在本质和潜在走向的独到体认与敏锐把握基础上的“未来性”。

对于青年作家的培养是《花城》的优良传统。20世纪八九十年代，《花城》通过推出“岭南风”（1983.1）、“广东女作家作品小辑”（1987.2）（1987.3）、散文诗（1988.1）特区军旅文学（1990.4）、《大鹏湾》小辑（1991.2）、广东作家小辑（1993.1）、新小说（1994.3）等专栏和专辑，大篇幅地集中刊登青年作家的作品，大大推动了青年作家和当地文学力量的成长，开掘他们的创作潜能，激发他们的创造意识。此外，《花城》的责任编辑或主编们还时常亲自上阵，在“创作与批评”、“花城论坛”等栏目上，为青年作家作品撰写评论，热情洋溢地点评。《花城》的执着有时甚至让人觉得惊奇：对于文学新人，只要《花城》认准了，它甚至会以头条推出。中肯地说，《花城》对于文坛新秀的推介可谓是不遗余力的。诚如它自己在2004年第1期《花城出发》栏目上的《编者按》中所言：“《花城》一直是作家们的摇篮，他们从这里出发，《花城》陪伴他们前行。”但也许是《花城》推举新人的行动发展得过于极致，历来也就引起了许多不必要的非议：一些文学新人的先锋性太强、还不成熟的作品的大量刊登，常常使人看后摸不着意思。此外，我们也认为，执一事之极往往是不正常的。新人新作的过量刊登，一方面，会挤压了那些进入成熟期的作家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会使人对年轻作家会产生揠苗助长的负面影响，20世纪90年代末期文学期刊对“70年代人”的追捧都颇有这种意味。《花城》也未能避免掉落这怪圈。

三

许多人以为《花城》先锋地位的形成，与其先天的区位优势有关，因为资源的缺乏自然需要靠出位去弥补。然而《天涯》主编蒋子丹却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许多刊物靠蒙，唯有

《花城》清醒。”的确，在先锋文学思潮达到鼎盛时期的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因先锋文学前卫的叙事艺术和语言实验让人耳目一新，故很多文学期刊都纷纷“赶车”上班。随着环境的变化，江河落尽，唯见其华的独有《花城》、《大家》等少数几家。究其原因，正是《花城》对中国先锋文学的真正执着。而在这背后最不可忘记的一个人，是《花城》的现任执行主编——田瑛。

俗话说，刊物的面孔就是主编的面孔。相对于文学批评而言，编辑的审美视野与选稿标准往往更为直接地影响作家尤其是文学青年的审美选择。独断的、保守的、功利的编辑，往往会用单一的、自以为正确的审美标准去衡量和要求作家，催生出狭隘的、缺乏活力的、一成不变的文学。而一个开放、宽容的编辑则能够发现更多的优秀作品，培养更多优秀的文学新人。因此，编辑家除了要有学者的深厚学养，还要有多向的、跨越性思维，不党同伐异，具备一种通过燃烧自己来传递人文薪火的文化人格。20世纪90年代末，《钟山》主编徐兆淮把文学期刊的主编划分为“作家型”、“学者型”和“官员型”^⑨。而田瑛大约就属于“作家”这一类。他早年写了很多小说，在国内外刊物上均有发表。“历史的浓郁之气在超脸型上里鬼魅穿梭”，“对艺术呕心沥血”^⑩。但与很多作家办刊风格不同，田瑛并不以自己喜好为标准，仅局限于一家之作，他的编辑风格中还显露出一种综合化倾向，对于作品中那些从灵魂深处生长出来的语言，那前卫的艺术感觉与形式，他往往能同气相求，兼收并蓄。

田瑛认为，一家有影响力的文学刊物，最重要的还是推出文学作品。1991年接手后，他对杂志的办刊方针作了根本性的调整，《花城》开始强调作品对艺术以及文本的探索，着力于发现以及扶植新起的先锋作家。普遍上认为，在当今，小说的文本和形式创新似乎已到了极限，各种小说的可能性都尝试过了，“文体创新”已成了一个相对或抽象化的说法，人们对先锋小说“形式主义”文体的怀疑和批判日趋严重。但与很多批评家的观点不同，田瑛并不赞成这种“先锋文学落伍”的说法。他始终认为，“中国的小说最缺乏的就是形式，而先锋小说的最大贡献就是破除中国文学传统中固有的形式。同时中国作家的文本意识太弱。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出现任何被人广泛认同的新文本。这种局面的出现也与媒体、刊物的引导以及提供的园地有关，然而刊物是无法创造文本的，文学的真正突破还是靠作家本身。中国当代文学的真正繁荣，需要有大量不同文本的作品出现，然而很遗憾的是，许多作家都没有走得太远，当初不少的先锋作家都纷纷向传统妥协。”^⑪小说的写实成分在增加，现实感在增加，而形式上则越来越趋于保守和稳妥。大环境的变化在影响着《花城》。这种情境下，《花城》对纯文学阵地、对先锋文学的坚守也慢慢地从自身上出现了怀疑的情绪。但它却似乎没有觉察出来。有眼光锐利的评论家指出：“在浮躁的、功利的文学氛围中，不少姿态前卫的文学期刊也开始显露出改弦更张的趋向，先锋文学的阵地正不断地被主流文学所占领。《花城》对于先锋文学的推动功不可没，但在90年代后期，它所刊发的写实性风格的作品呈上升趋势。”评论家还对1996~2000年《花城》被《小说月刊》转载的情况进行深入的个案分析，发现1996年和1997年被转载0篇，1998年被转载5篇（潘军的《九十年代的获奖作品》和《对门·对面》、迟子建的《观慧记》、叶兆言的《别人的房间》、毕飞宇的《生活在天上》），2000年被转载6篇（潘军的《重瞳》、红柯的《帐篷》、北村的《公民凯恩》、毕飞宇的《青衣》、苏童的《女声》、行者的《皇后风物志》），认为“通过对这五年的分析，可以发现其转载率依靠几位‘高转载率’的作家支撑着，而那些真正前卫的作品反而不被注意”^⑫。此话不无道理，的确，在这日趋一统的文学语境下，《花城》等先锋文学期刊的编辑们精心策划的文学实验在众语喧哗中被步步围困，被趋同化。他们的先锋实验得不到承认，而与他